

「匪俄對立」與世界新形勢

原子林二郎著
吉田悦子譯

中共跟蘇聯的關係正多方面發展中，在這個簡短的報告裏，不僅難窺其全貌，即使單就對國際關係極為重要的幾個側面而言，也不可能一一觸及。所以我在這裏只想指出匪俄關係的基本性質。

中共參加聯合國後，已經引起若干反應，但從匪俄關係看來，那是把匪俄的直接對立擴大到聯合國這一新戰場了。在聯合國，匪俄關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糾紛、孟加拉國獨立運動、裁軍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激烈地對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號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裁軍演說，更可證明兩國的衝突的尖銳。一般說來，一個國家（中共）的代表從講台上，面對面用手指着別國（蘇聯）代表，痛罵「你們表面像牛那樣強悍，實際上像老鼠一樣胆小，你們是虛有其表的稻草人」，如此的沒有禮貌，從聯合國開始以來，這恐怕沒有前例的。作爲和平共存和國際安全保障中心的國際機構，其權威與機能，本來就日漸低弱，現因中共參加，而陷於癱瘓狀態的可能性極大。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到夏天，匪俄邊境上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同年九月周恩來與柯錫金在北京機場會談，特別是周恩來展開柔軟的微笑外交以後，在人們的印象裏，匪俄關係似乎在若干領域裏，其緊張程度，已比較緩和。實際上，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四次大會中的報告，也提到匪俄關係已有若干正常化的先兆。並且列舉了幾個例證。

日本也有很多人注意這樣的現象方面，認爲這就是周恩來緩和緊張外交方針的表現。可是在巴基斯坦糾紛中匪俄的正面衝突，顯然地證明了所謂周

恩來緩和緊張的外交方針，只不過是轉換戰術，不是變更戰略。而且，布里茲涅夫當時所謂匪俄關係有點兒正常化徵兆，其所列舉的例證之一，就是北平的匪俄邊界談判，如此而已。

如所周知，這個會談的課題，不是直接處理沙皇俄國從中國奪取的六十七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只限定再確定或再調整四千五百英里的中俄國境線上只幾個糾紛地點的邊界線。

儘管這樣，這個會談開始以來已經過了七百九十五天（截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號止），問題的解決，並沒有一點兒進展。換句話說，這個會談開始以後馬上掛出「暫停營業」的招牌，而且一直掛到現在。

在日本檢討匪俄關係的時候，我們常常忘記或忽視一些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爲國家政治和經濟彙集點的軍事。關於在中俄國境上中共和蘇聯各各配備的兵力和裝備，有很多的說法，本報告雖不擬多所涉及，但是兩國都在國境集結着包含最高兵器在內的精銳大軍，以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互相敵視。說穿了，中共跟蘇聯都在所有部門中，實施戰時體制。

忽視了這個情況，我們就不能談匪俄關係。就蘇聯來說，布里茲涅夫一面講匪俄關係有點兒正常化的先兆，但在這一年半當中（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七一年三月），蘇聯在中俄國境却增加了至少十個師以上的兵力。

在日本關於匪俄對立，有從各式各樣的觀點而來的形形色色的意見。但是我們在這裏回溯一下這個問題的起點，研究一下對立的基本動機（原因 motivation），想來也不是徒勞的。

關於匪俄對立，如果把它當作對於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觀之列寧主義方

式和毛澤東主義方式的對立，以此為中心來予以觀察，那只不過是學院式的嘗試而已。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的「紅旗」雜誌發表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論文，初次對「蘇聯」關於世界革命戰略中的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觀點，公然提出挑戰。此後，匪俄對立首先主要是以思想論戰的形態出現。但是，中共與蘇聯共產黨之間，如果只是思想體系的爭論的話，那麼，即使像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所說，思想意識是不能共存的，但從國家觀點看來，表面上偽裝共存仍有可能。何況中共與蘇聯都施行同樣的社會制度，都主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為基礎，兩國的武裝兵力本來不應該發生邊境上沾滿血跡的互相殘殺事件。匪俄共產主義者關於思想意識的爭論，因為受着領土問題、民族感情、歷史的或文化的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其他許多因素的刺激，和個人或少數獨裁集團的權力與利益的煽動，實際上共存的餘地與可能性一點兒也沒有了。而且，本質上無大差別的匪俄思想體系爭論，在論戰的過程中越來越墮落了。現在誰都知道，這個匪俄爭論越來越否定了思想體系，或沒有了思想意識的性質，而深深陷入互相痛罵和互揭瘡疤的醜態。

在文化革命後的中共，黨跟國家的關係，還在變動不定中。不過共產主義國家中，基本上仍是黨支配國家，而且國家就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對沒有單純的黨的思想體系鬥爭。黨的思想體系是以國家的思想體系登場，黨的利益作為國家的利益來表現。正如同布里茲涅夫在第二十四屆黨大會中所宣示，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對中共的反蘇路線，要毫不姑息的從事鬥爭那樣，匪俄對立是黨跟國家一體的對立抗爭。

那麼，我們就想到匪俄糾紛中的國家利益到底是什麼。首先我們應該從在共產主義世界上存在二個大國家（「中共」跟「蘇聯」）這一單純的事實來開始考慮。

托洛斯基於一九〇四年在以「我們的任務」為題的論文中，指出列寧的黨組織是「黨的組織代替了黨，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的組織，最後獨裁者代替了中央委員會」。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權力鬥爭的歷史，這是它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基本的一面。就蘇聯共產黨的歷史看來，從列寧、史達林經過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就是一部獨裁權力的鬥爭史。

這些權力鬥爭和政策鬥爭糾纏在一起，政策鬥爭也伴隨着權力鬥爭。有時候又不關涉政策而是單純的權力鬥爭。

總而言之，權力鬥爭是跟共產主義分不開的。只要共產主義存在，不論哪一個共黨中，其領導人之間血腥的權力鬥爭就會永遠繼續。

以最近的事例言，波蘭於一九七一年發生了黨的第一書記Edward Gierek（外來派）跟一個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Mieczysław Moczar（遊擊隊派）激烈的權力鬥爭，結果是後者敗北，從政治局與書記處被驅逐了。在一個黨中存在二個或二個以上强有力的領導人的話，權力鬥爭就宿命的不可避免。一個黨的權力鬥爭，一方肅清或放逐了另一方，那時候大體上獲得了暫定的結果。但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各强有力的黨跟黨之間的權力鬥爭，肅清或放逐都不可能。在一九三八年史達林曾勾去了波蘭共產黨，可是我們不能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跟當時少數而力弱的波蘭共產黨等量齊觀。

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創立第三國際（Komintern）的一個重要意圖，是使世界上的各個共產黨都為蘇聯共產黨的利益服務。蘇聯共產黨的利益即是保衛並維持那時候兒還很年幼的蘇維埃共和國。史達林的第三國際戰術的意圖，正如同一九二〇年代第三國際關於國共合作跟中共革命路線的各項指令所顯示的一樣，是為蘇聯的利益，而把別的國家的共產黨加以利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設「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 Cominform」的動機，也同樣是要支配別的共產黨，謀求蘇聯共產黨跟國家的利益。

假如中共對蘇聯的利益獻身地効勞的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中，就絕對不會發生匪俄對立和權力鬥爭。可是，有廣大的中國大陸跟近八億人口作背景的中共，只有落後國家的脆弱的經濟力，被壓抑在有限的物質資源跟原始的農業之下。中共基于有托洛斯基主義傾向的「社會主義之原始蓄積」（普列奧拉增斯基 E. A. Preobrazhensky）主張而做急激的工業化嘗試，結果引起「大躍進」的悽慘失敗，給予中共社會和經濟組織以致命的打擊，使毛澤東的權威大受損傷。於是，讓共產主義世界為中共的黨跟國家利益服務，就是為自己的內政外交的利益而利用其他共產黨，中共也不亞於蘇聯，對它是特別重要的。

這麼一來，中共與蘇聯的權力鬥爭從兩個方面看來，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存在二個强有力的領導者（黨和國家）；第二、為了最終統治世界，中共跟蘇聯各各絕對必須自私自利的利用共產主義世界。

可是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先有一九四八年的「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事件，次有一九五六年蘇聯第二十屆黨大會中赫魯曉夫的批判史達林，於是，過去在蘇聯單一支配下的共產主義帝國，就發生了無法挽回的龜裂。在此基礎上，又有了跟蘇聯共產主義不同形式的中共出現，於是蘇聯帝國內各黨的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過去一直被抑制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慢慢地開放，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就開始分裂。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由于（一）各小黨謀求獨立自主，不願片面地對別的大黨和國家服務，而維護自己黨的利益；（二）動向增強，和國家（匪俄對立這兩個因素而愈益加速。現代共產主義世界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多中心化在毫不遲疑的進行。

中心（UEHTP）越來越多，就會把無中心當成終點站，目前就正對向那個目標前進。至於這一進程不能達到終點不是重要的。從長遠觀點看，這樣的分裂過程，或許會增強各黨的地位，但共產主義世界運動的整體，必然會削弱吧。這一點才是重要的。

上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細分過程，意味着在共產主義世界中，蘇聯越來越失掉領導權力。不過蘇聯為維護國家利益，進而支配世界，必須要恢復其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力。

另一方面，中共也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完成對世界的統治，越來越想取代蘇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但是從時代潮流看來，共產主義世界越來越細分化，而獨立自主的傾向越來越加強。特別是各個小黨，如果沒有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不只不能擴大黨的勢力，就連黨的存在也有危險。因此，不論是蘇聯想恢復單一領導權，或是中共想取得新的領導權，都將是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這意味着是對從歷史上看已經被否定而不可能實現的事，做着徒然地挑戰。

可是從現象方面看來，急圖恢復差不多已經失掉的領導權而無望地努力着的蘇聯，跟想要獲得還沒有到手的領導權的中共之間的權力鬥爭，正因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對來自哪一個中心（UEHTP）的統治都加以抗拒的動向正逐漸加強，匪俄間也就不可避地更毫不猶豫、不擇手段的相互鬥爭。這是匪俄對立激化的一個起因。

如上所述，匪俄對立基本上是遍及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權力鬥爭。那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或別的共產主義領導者個人統治世界的野心。那是黨跟黨或國家跟國家整體的鬥爭。用和平的手段統治別的黨的嘗試，正如一九六九年六月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的時候兒一樣，只能使分裂更加深，對立更暴露。匪俄權力鬥爭以和平的手段已不可能解決。一個黨要支配別的黨，一定要如同同一九六八年蘇聯武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樣，採取一種純粹的軍事行動。為了讓它不再叛離，除了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威壓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實際上在共產世界內部，一個黨或一個國家用政治力和經濟力支配別的黨或國家的事，越來越困難而近乎不可能了。在東歐，波蘭著名的社會學家 Jan Szczepanski 說過：「在共產圈內部各個黨或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各種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強烈地暗示為反抗蘇聯的支配，維護波蘭的利益，應該加強自己的國力。（「Zycie Warszawy」報，一九七〇年六月四號）

這樣的共產主義小國的覺悟，不只波蘭一國。至於像中共那樣大黨、大國蘇聯要想扭住胳膊制服它，除了武力制壓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在蘇聯國內，從一九六九年以來，以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武裝兵力（Komynynt Boophcehlx Cny）共產主義者」為中心，連續討論對中共的預防戰爭的可能性，和對付人民戰爭的戰術，絕對不是偶然的。中共為了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並且為了壓服共產主義世界，達成其支配世界的最終目的，除了積蓄和提高軍事力量以外也沒有其他辦法。

所以中共就忽視人民的貧困，不惜破壞其落後而不平衡的經濟，而拚命地發展和擴大它的核武器。中共這樣在防禦和攻擊兩方面擴大軍事力的努力，已成爲其領導內部不斷在各方面發生對立鬥爭的一個主要原因。

除了中共和蘇聯以外的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個共產黨，爲了減低中共跟蘇聯的影響力，而鞏固其在外交和內政兩方面的獨立自主性，匪俄對立倒成爲必要的。這些黨的獨立自主願望，使蘇聯恢復領導權的野心不可能實現，就必然會更加強它對中共的鬥爭。這樣矛盾的邏輯，對中共說來，也起同樣的作用。

中共要削弱蘇聯對外國的權力，就必須訴諸各共黨的民族主義，而煽動其各自的獨立自主性，加強其對蘇聯的離心趨勢。但是，挑逗各黨的民族主

義，其究極的結果，是連中共的領導權也被拒絕。因之，加深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或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亞各共黨對蘇聯的離心傾向，并不就意味着能促使它們追隨中共。

一九七一年六月羅馬尼亞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訪問中共的時候，他的很多發言，證明中共跟羅馬尼亞的共同點只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而已，在別的多方面，羅馬尼亞跟中共却採取不同的路線。

總之，匪俄對立對別的共產主義勢力的獨立自主是必要的，但却使得中共與蘇聯的孤立化，成爲一般的長期的傾向。

匪美接觸在對外路線方面，引起了共產主義世界的重大問題。首先是北越對中共的懷疑。儘管有中共領導人再三的信誓旦旦，儘管有中共與北越之間代表團的頻繁交換、訪問跟共同聲明，但北越根深蒂固的不安——美匪是否在北越的背後，對越南及印度支那問題進行暗盤交易——絕對還沒消除。北韓也是一樣。現在中共對北韓的外交工作在露骨地加強，不過另一方面平壤也擔心美、匪是不是在北韓背後對關乎朝鮮半島運命的問題進行商談？這種疑慮也越來越強。

從匪俄關係的分野看來，正如同美蘇接觸經常以中共爲對象一樣，匪美接觸也是以蘇聯爲對象的。中共是爲利用美國，來削弱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才與美國接近。美國則想利用中共，使它（美）跟蘇聯的關係轉變得對自己有利，才接近中共。美國跟中共都想在匪、美、蘇三角關係的比賽中，占據有利地位來對付蘇聯。但是美國和中共的接近，使得匪俄關係不可避免地激化起來。

匪俄對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糾紛中，可以說典型地被暴露了。印、巴糾紛無非匪俄的代理戰爭。誰都知道蘇聯的駐印度大使 Hinkoyan Nerob Nikolai Pegov（黨中央委員）對印度的首腦部傳達了克里姆林的保證——就是萬一中共爲削弱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壓迫，嘗試某些武力干預，蘇聯就在新疆邊境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行動以牽制中共。當時萬一發生了這樣的事態，沒有人能保證印巴的「代理戰爭」，不會發展成爲匪俄間的正面衝突。

可是中共爲着對抗印度和其幕後的支持者蘇聯，竟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對東巴加以恐佈的暴力壓迫，圖謀那裏的民族自主獨立運動，淹死在血泊中，

充分暴露了自己反動的真實面貌。

孟加拉糾紛，使聲言反對超級大國，而站在各小國反帝民族自立運動最前列的中共，在亞非各國之前現了眼。在匪俄對立中，中共被迫作了可恥的自我暴露。

蘇聯給印度撐腰，支持孟加拉的獨立，其動機是誰都知道的。蘇聯的意圖正是要宣傳解放民族的真正領導人，不是中共而是蘇聯，同時爲了對抗中共，把孟加拉國變爲蘇聯的滿洲國，和蘇聯海空軍進出印度洋相配合，把孟加拉國變成爲它支配亞細亞的基地。

匪俄對立以美國爲媒介，在所有的領域中，都有着擴大和激化的趨勢。不論規模的大小，匪俄軍事糾紛爆發的可能性，是隨時都存在的。因此，不但要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是以支配全世界爲目標的匪俄權力鬥爭，結局除了以兵力打倒對方以外，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當然，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共和蘇聯也會各各發生互相排拒和種種反應的作用，希望匪俄關係緩和或和解的力量也會有所活動。所以我們不能斷定匪俄對立現在已經達到極限，一定會直接走向戰爭。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匪俄之間的權力鬥爭，在論理上原本就是有時候會稍微有若干緩和與和解的動向，今後也將時起時伏地繼續發展。

匪俄戰爭是否會發生，在分析其許多因素之前，我們先應該一再玩味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 Frederick C. Barghoorn 教授所說的話：「如果能養成不斷考慮種種可能性的習慣，那我們所受的衝擊會更小，不愉快的驚愕也會更少些。」即便是那樣，但匪俄對立不止是思想意識，連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頹廢跟墮落也無遺地表露出來。

從長遠觀點看，已經墮落成這個樣子的共產主義，是通過緩慢的自我變質過程，達到和平的壽終正寢，還是通過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民衆掀起那樣的暴力過程予以清算，或者還有別的辦法來解決？倒是一個十分有趣、富有魔力、值得探討的課題。

			敬
		批	請
	指	評	
訂	導		
閱			